

第一章

中国留学生之父



容闳 1828—1912
Rong Hong

引子

容闳是19世纪最杰出的中国人之一。他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非常幸运地在澳门、香港和美国接受了西式教育。他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第一个中国人。

他是“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的中国哥伦布。容闳原本可以在美国享受舒适而富裕的生活。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回到家乡，投身于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他身处的清朝政府傲慢而排外，这对他来说是巨大的挑战。

他前往美国为上海的江南造船厂采购设备，那是中国首次能够制造西方列强所使用的重型装备。

1870年，清政府接受了容闳的提议，派中国青年赴美学习，让那些青年像他一样，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探索现代世界的奥秘。1872—1881年，他受命组织留学项目，负责将一百二十名中国学生送往美国的中学和大学接受教育——此前，该项目曾被清政府中的保守派取消。

这些学生回国之后，在教育、工程、外交、医学、工业、军事、商务和其他领域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堪称众多领域的先驱。在此后的三十年中，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跟随他们的脚步，前往北美、欧洲和日本的大学学习，将掌握的技术和知识带回中国。

容闳是光绪皇帝强而有力的支持者，1898年改革失败后，

他不得不逃亡香港。他还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党。当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取得胜利之时，他正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家。孙中山邀请他回中国任职，但他不幸于1912年4月12日辞世。

1876年，在百年庆典上，耶鲁大学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的荣衔，表彰他对中美文化交流做出的巨大贡献。2004年，耶鲁大学在他毕业一百五十周年之际，为他竖立了一尊雕像。

童年

1828年11月17日，容闳出生于佩德罗岛（Pedro Island）的南屏镇，这个岛位于澳门西南六公里。

容闳在家中排行第三，有哥哥、姐姐和弟弟。这是个贫困的家庭，他的父亲租了三亩地，养鱼养虾。由于南平没有学校，父亲便将他哥哥送往邻村的私塾里读书。

巧合地，容闳父亲的一位邻居和朋友是玛丽·温施拖·郭士立夫人（Mrs Mary Wanstall Gutzlaff）澳门家中的佣人。玛丽是传教士卡尔·郭士立（Rev. Karl Gutzlaff）的夫人，这对夫妇为中国的孩子成立了一所学校。这位邻居将学校的消息告诉了容闳的父亲，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引荐，1835年，容闳七岁入学。

“对我来说，父母为什么在深思熟虑之后将我送到外国学校学习，而没有去哥哥学习的正统儒家学堂，一直是个谜。”容闳在1909年出版的自传《西学东渐记》（*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中这样写道，“（去儒家学校）要比允许我去上一所英国学校更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情感、品味和需求。”中国学校是唯一通向职业发展、权力和财富的大道，“当时中外交流刚刚开始增多，我的父母预测这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一种潮流，觉得值得抓住时机，让他们的一个儿子学习英文，这样他可能成为高级翻译并拥有更有利的社会地位，从而进入商业和外交领域。”

作为香山的居民，容闳的父亲要比大多数中国人视野开阔。自从三百年前葡萄牙人来到了澳门，香山已经极大地受到了澳门这个西方贸易和宗教中心的影响。许多香山人都去澳门工作并在那里定居，繁荣发展。容闳的父亲看到这种能使儿子同时在中国和西方世界中工作的机会；另一个原因是澳门的学校豁免学费和住宿费，但在中国学校则要收费。

无论如何，这是身在乡下的农民做出的非同一般的勇敢决定。他没有把儿子送到一所知名而完善的学校，而是送到一对外国夫妇刚刚创立的、在内地可能是非法的学校。

澳门学校

这所学校由英国传教士玛丽·温施拖创立，她前往马六甲教书，并在那里遇上德国传教士郭士立。他们于1831年搬到澳门居住，并于1834年结婚。

他们决定用自己的房子来做学校，为中国的孩子提供西式基督教教育，由玛丽担任老师和校长。这是中国第一所此类学校，经费来自为了纪念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而成立的马礼逊教育协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马礼逊是中国首位新教传教士，于1834年8月1日在广州去世，享年五十二岁。他被埋葬在澳门的新教公墓。

马礼逊教育协会是由富有的英国和美国商人创建的，他们仰慕这位将《圣经》翻译成中文，并撰写了首部六卷汉英词典的先驱。他们希望通过协会让他继续教育工作。协会的使命就是“通过学校和其他手段改善和提高中国的英文教育”。

澳门新教教堂位于白鸽巢公园附近，是以罗伯特·马礼逊的妻子的名字来命名的。教堂的土地和毗邻墓地是在1821年，马礼逊的妻子玛丽去世后购买的。

这所学校离圣保罗教堂遗址很近，那所教堂在1835年1月26日被一场可怕的大火付之一炬。

马礼逊教育协会每个月向郭士立夫妇提供十五英镑用于经营学校。学校于1835年9月30日开学，共有十二名女生和两名

男生，容闳就是其中之一。额外的资金来自促进女性教育的印度及东方妇女教育促进会（The Ladies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Female Education in India and the East）。

由于丈夫大部分时间外出，沿着中国海岸线传福音，真正关心孩子们穿衣、吃饭并教育他们的是玛丽·郭士立。学校既有中文课程，也有英文课程。

容闳七岁的时候，父亲将他带到学校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他成为一名住宿生。他们离开南屏镇，乘坐一条小船来到了澳门。他们步行到学校，容闳见到了郭士立夫人。他这辈子从没有见过“大鼻子”，更不要说是身穿飘逸的白色礼服裙的“大鼻子”了。他充满恐惧，全身颤抖，并且紧紧抓住父亲。

“她个子有点高，身材健美。”容闳写道，“她突出的特征就是性格坚强、特立独行。她有一双清澈的蓝色眼睛，目光深邃。她的头发是淡黄色的，眉毛有点重。总体来说，她的相貌表明她具有极大的决心和意志力。与其说我有些困惑，还不如说我深感震撼——我的生命中从未遇到过如此奇特和古怪的人。”

幸运的是，她以善良和同情心赢得了他的心。因为容闳是班上最小的学生，她特别关心他，让他和女生一起住在学校的三楼，另一个男生则住在一楼。

容闳很快适应了新环境，而且开始喜欢自己的老师。但是，他和女生不被允许外出。他讨厌被关在学校里，于是在入

学第一年的某天，组织六名女生进行了一次“逃亡”行动。当郭士立夫人还在用早餐时，他们跑到了附近的码头，乘上早已租下的一条双桨小船，抄近路回到他家所在的佩德罗岛。

但是他们的动作还不够快。夫人组织了搜查队，一条四桨小船赶上了他们。七个人灰头土脸地被带回学校，并在其他学生面前罚站一小时。容闳的胸前还挂着块牌子，上面写着“逃跑头目”。他站在六个女孩中间，“我这辈子从没感到这么丢脸”。

他没有再犯错。他全心投入学习，在这所西式学校里学习英文和其他课程。在清朝皇帝的四亿一千三百万臣民中，只有极小一部分人掌握这种知识。

1839年，中英关系由于鸦片问题日益恶化，战争一触即发。为了个人安全考虑，玛丽·郭士立决定离开澳门，前往美国。她带上了学校里的三名女盲童。

后来，她的学校关闭了，容闳和其他学生一起回到家里。他开始打工，在家乡的村子和邻村贩卖糖果。他早上3时起床，晚上6时才回到家。他把每天挣到的两角五分钱都交给母亲。春天，他开始在稻田里工作。

1840年秋，容闳的父亲去世了，这使他的母亲失去了主要经济支柱。儿女出去找工作谋生对她是至关重要的。后来容闳去澳门为一位天主教神父工作，神父需要找一个懂英文的人做文书工作。容闳把大部分薪水交给母亲。接下来的两个月，容

闵帮助一位外国传教士在他的医院行医，准备各种药丸和药膏的材料，并陪他巡视病房。

马礼逊学堂（Morrison School）

与此同时，马礼逊教育协会希望为孩子们建立一所更大的学校，并开始在英国和美国寻找一位传教士经营这所学校。他们最终找到美国教育家塞缪尔·勃朗（Rev. Samuel Brown），他于1810年6月16日出生在康涅狄格州，毕业于耶鲁大学。这个人在容闳的人生中将会起重要作用。

勃朗先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Columbia, South Carolina）学习神学，1834—1838年在纽约聋哑学院（New York Institution for Instruction of the Deaf and Dumb）教书。他很渴望成为一名海外传教士，就申请了在澳门的这个职位，而且被接受了。他和妻子于1839年2月24日抵达澳门。由于船主的帮助，他得到了从美国到澳门的免费船票。

1839年11月4日，他在马礼逊教育协会提供的一所房子里开始办学，当时有五名学生。学校教授小学算术、地理和阅读，上午用英文授课，下午用中文。每天都有八小时的课程、三小时在大操场上的运动和娱乐。孩子们不可以离开学校，每年春节的时候可以在家待一个月。

“这不仅仅是个教学机构，更是个教育机构。”1840年4月29日，勃朗先生在写给马礼逊教育协会受托人的一份报告中称，“其目标是从身体、智力和道德上全面培养人。”

容闳已经离开学校一年了，马礼逊教育协会的董事们还记得这位优秀的学生，非常希望他回来。1841年，医生把容闳带回了学校，他成为这里的第六名学生。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由协会和私人承担。

1842年，作为鸦片战争的战果，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政府，学校也从澳门迁至香港。政府向学校捐赠了海平面上一百八十多米的一片土地，那里仍被称为“摩理臣山”。

鸦片

正是创建马礼逊教育协会的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的慷慨，才使容闳和他的同学有机会接受教育。澳门还有传教士医生，他们为人们带来以往从未得到过的高质量的医疗保健。

传教士相信他们为中国人带来文明的祝福，而这种文明正是来自他们的国家。在医疗、教育和宗教领域，他们这种说法是不无道理的。

但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着他们的工作——鸦片贸易。许多创建马礼逊教育协会的商人都为以鸦片为主要商品的公司工

作。鸦片在印度种植，尽管政府明令禁止鸦片交易，鸦片仍在中国销售。

在1832年创立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之前，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已经在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工作了十四年。这家公司的主要商品是鸦片、茶叶、丝绸和棉布。正是他在1839年说服了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就鸦片向中国发动战争。他提供了一份详细的计划、地图、策略，甚至包括所需军队和军舰的数量。他是原马礼逊教育协会的董事会成员，也曾为建立澳门眼科医院做出贡献。

兰斯洛特·颠地（Lancelot Dent）也是原董事会成员并曾给医院捐款。他和他的兄弟一起成立了宝顺洋行（Dent & Co.），在规模上仅次于怡和洋行。这家公司也积极参与鸦片交易。1839年，中国时任钦差大臣、两广总督林则徐逮捕了颠地，强迫他交出店里的鸦片。正是这一事件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1839年，林则徐在广东虎门捣毁了两万箱鸦片，每箱鸦片最少价值一千美元，这堪称巨大的损失。英国不愿意用昂贵的白银替代廉价的鸦片来支付中国货物的款项，便于1840年发动了这场战争。

许多中国人都将传福音同鸦片联系起来。传教士们最初就是乘坐装有鸦片的船只来到中国，又随船沿中国海岸线航行，抵达各个港口。马礼逊曾在广州为鸦片的主要供货商东印度公

司担任翻译；容闳第一位老师的丈夫卡尔·郭士立，也曾乘坐鸦片船在中国的不同城市传教。

“一只手拿着鸦片，一只手拿着《圣经》”，是在未来一百年对西方传教士的指控。在19世纪下半叶，他们将成为这项贸易最强大的反对者，特别是那些见过鸦片对中国人造成毁灭性影响的传教士医生和牧师，这些中国人是他们的病人和会众。

容闳和他的同学们是幸运的。他们得到了外国人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而不是毁了他们千万同胞生活的鸦片。

前往美国

容闳和五个同学在香港马礼逊学堂的新校区平静地学习和生活，学生的数目后来增加到四十人。那里的氛围快乐而和谐。勃朗夫妇像对待自己的家庭成员一样对待这些学生，男孩子们则回报以挚爱和忠诚。

直至1846年8月的一天，容闳的人生从此改变。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勃朗先生告诉校委会，他和夫人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决定返回美国。“我非常热爱这所学校，希望带走几个学生，直至他们完成学业。有谁想和我走，请站起来。”

大家都被这消息震惊了。他们非常喜欢勃朗夫妇，根本无法设想这所学校没有了他们会怎样。可谁又能想象越过大洋前

往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家呢？

几分钟之后，没有任何动静。这时，容闳站了起来，另外两名学生黄宽和黄胜也跟着站了起来。勃朗先生让这三个人先征得父母的同意，毕竟这是个重大的决定。

“我母亲极为勉强地同意了。”容闳说道，“我特别诚恳地请求她，她虽然伤心难过，但最终还是屈服了。”他安慰母亲说，还有另外三个孩子和即将过门的媳妇可以照顾她，容闳的哥哥马上就要结婚了。

这三个人是首批前往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正是英国和美国的赞助人使这一切成为可能。他们不仅希望帮助这三名学生完成学业，还同意为他们的父母提供两年的财务支援。

此外，戴维·奥利芬特（David Olyphant）和他的两个兄弟，免费为勃朗夫妇和男孩们提供了从香港到纽约的船票。他的两个弟兄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他们让勃朗夫妇一行搭乘的“女猎人号”（The Huntress），是自己公司的一艘运茶船。它们是唯一拒绝从事鸦片交易的主要贸易公司，因此，公司的办公室被称为“锡安的角落”（Zion's corner）。他们希望支持传教项目。

这条船于1847年1月4日从广州起航，经好望角到达圣赫勒拿（St. Helena），他们在那里见到了少量的中国家庭，并参观了拿破仑的空墓。他们一行人于1847年4月12日抵达纽约港。这

是一个有四十万人口的城市。

勃朗牧师将三个男孩子带到马萨诸塞州的孟松（Monson），交给自己的母亲菲比（Phoebe）照料。她给他们安排的房间就在自己房间对面。每天她都为孩子们做饭，照顾他们。

三人进入孟松学院（Monson Academy）学习。这是一所成立于1804年的私立预科学校，也是美国东海岸历史最悠久的十五所精英学校之一，即便是大多数的美国人也无法进入该校学习。这里是进入社会统治阶层的阶梯，正如英国那些昂贵的私立学校一般。孟松学院正是模仿英国私立学校建立的。

这所学校的校长是查尔斯·哈蒙德牧师（Rev. Charles Hammond），他和勃朗牧师一样，毕业于耶鲁大学。他们想把这三个中国年轻人送到耶鲁。耶鲁和哈佛大学是美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耶鲁的课程包括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生物、文学、数学和哲学。

1848年秋，黄胜决定返回中国，另外两人则继续留在美国。他们于1849年夏天从孟松学院毕业，学制包括十二个月的希腊文和十五个月的拉丁文。容闳成绩最好的课程是英国文学，数学则比较弱，必须努力用功才能通过耶鲁大学的入学考试。

他们在香港的赞助人表示，如果他们愿意去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深造，这些赞助人愿意继续给予支持。黄宽决定前往，并作为一名医生从爱丁堡大学毕业，他也成为首位接受西医教育的中国留学生。黄宽于1857年

返回中国，并开始他作为医生和教师的辉煌职业生涯。（黄宽的事迹见第二章。）

进入耶鲁

容闳希望留在美国，去耶鲁大学学习。与此同时，他也承受着来自家庭的压力，尤其是他的母亲希望他能回国挣钱养家。他们也担心容闳会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再也不回中国。

在他的家书中，容闳强调他留在美国只是为了完成学业，毕业后就会回家。1850年冬，母亲写信告诉容闳，他的弟弟已经去世了。“这封信让我难过了整整两个星期。”在写给广东一位朋友的信中，容闳说，“我灵魂的眼睛可以看到他们所处的困境，我应该回家。但是，考虑到目前的状况，我只有为他们祈祷。”

尽管遭遇这些困难，但容闳成功地考入耶鲁大学，他是耶鲁大学历史上迎来的首位中国人。对于来自广东乡村贫困家庭的儿子，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成就。

但是，他无法负担学费和住宿费，于是向勃朗牧师和哈蒙德校长寻求建议。他们告诉容闳，只要容闳答应在毕业后回中国做一名传教士，他们愿意提供资金。

容闳对他们的提议表示感谢，但婉言谢绝。“我想要最大

程度的行动自由，使自己能利用每个机会为中国谋求最大的福祉。”他写道。其次，他并不是一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再者，这样的承诺“将阻止我利用其他可能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机遇，最大限度地为她服务”。

不过，他最终从佐治亚州的萨凡纳女士协会（The Ladies Association of Savannah, Georgia），以及为他提供从香港赴美免费船票的奥利芬特兄弟那里获得了资金。此外，他还在一所寄宿俱乐部里担任管家，他洗衣服、准备食品、做服务员，还当过图书管理员。通过这些途径，他赚到了足够的钱以继续学业。

容闳是全体学生中唯一的中国人。他最强的课程是英文写作，并因此获得过两项学业大奖——这对一名外国人来说是很了不起的。哲学也是他的强项，希腊文和数学就比较薄弱。他喜欢体育锻炼，尤其是足球。他留着清朝男人的辫子，踢球的时候头上的“猪尾巴”也会跟着摆来摆去，这不仅使他吸引了周围同学的注意，更惹来无数笑声。他参与大量课余活动，除了是大学划船俱乐部成员，还在合唱团里唱歌。

1852年10月，他成为美国公民。1854年，容闳与九十八名同学一起毕业，专业是英国文学。他是耶鲁大学历史上首位中国毕业生。许多人来参加毕业典礼，就是为了见见这个中国人。

1878年4月10日，在对法学院肯特俱乐部（Kent Club）的演讲中，后来成为他妹夫的约瑟夫·吐温切尔牧师（Rev. Joseph



容闳在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上

Twitchell) 这样描述容闳在耶鲁大学的经历：“他的国籍使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外来者，再加上他与生俱来的腼腆性格和贫困的家境，使他远离大学的社交活动。他没有什么知心朋友，但始终如一地保持自己的美德，这使他赢得了全班同学的尊重。”

返回中国

在耶鲁的最后一年里，容闳深刻思考着自己的未来，以及如何利用受过高等教育的优势。他对美国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不仅成为了美国公民，更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他在这儿结交了许多朋友。

但是祖国在他心中是最为重要的。他的朋友们写信告诉他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基督徒洪秀全领导了那场运动，洪秀全相信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

太平天国运动达到高潮时，洪秀全的队伍控制了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这场运动最终于1864年被镇压，两千万人丧生，大部分是平民百姓。这是中国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军事冲突。

“中国可悲的境况不停在我脑海中萦绕，影响着我的精神。在我结束大学的最后一年学习之前，我已经勾画出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我下定决心让中国的年轻一代享受到和我一样的教育优势：通过西方教育，中国有可能得到重生，成为开明而

强大的国家。实现那个目标成为我理想的指路明灯。我会竭尽全力向着那个目标奋进。”

容闳拥有了耶鲁大学的毕业证书，结交了许多朋友，并且获得了美国国籍，他完全可以在美国定居下来，享受舒适和成功的生活。许多公司和研究机构都为他提供工作机会，但是他全部婉言谢绝了。他甚至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祖国一直在他的心中。他很清楚自己一旦回国，将面临各种怀疑和偏见，而这些正是源自他所取得的成就。

他确实很希望在美国多待几年，学习土地测量。“但是我很穷，朋友们觉得再待一段时间会让我永久留在这里，而中国也将永远失去我。”所以他决定返回中国。

1854年11月13日，他和威廉·艾伦·梅西牧师（Rev. William Allen Macy）一起乘坐快船“尤里卡号”（Eureka）离开纽约回国，梅西牧师将接替勃朗牧师担任香港马礼逊学堂的校长。

驶往香港的航程全长两万四千多千米，为期一百五十四天。容闳形容这是他人生中最无趣和乏味的一段旅程。乘客只有他和梅西两人。这艘船并没有货物或压载，这使得它在惊涛骇浪之中几乎没什么能保护自己。

船一到香港，他就跑到澳门看望母亲，这是他在过去近十年间第一次见到母亲。“相见时我们喜极而泣，内心充满了感激和感恩。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有太多的话无以言表。她开始浑身上下地抚摸我，表达她浓浓的母爱，她的心至少为我

悬了十年。”

她问容闳作为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他得到了多少钱。“知识就是力量，力量比财富更伟大。”容闳回答她，“我是第一个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人。在当时中国千百万位母亲之中，您是第一位，也是唯一拥有美国一流大学毕业生儿子的母亲。这份荣耀无人可及。”她很高兴听到这番话。随后，她命令他把胡子刮了，因为这并不适合未婚的年轻人。他马上照母亲的要求做了。

他承诺要尽最大努力照顾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三年之中，他经常去看望她。她于1858年过世，享年六十四岁。容闳当时人在上海，他赶回香山，参加了母亲的葬礼。

重学中文

1855年夏天，他搬到广州重新学习中文。在离开的十年间，他住在一位美国新教传教士的家里，已经把中文忘记了。他迅速恢复了童年时代的口语——粤语，但发现书面语很难掌握，毕竟他在马礼逊学堂只学了四年中文。

他家离一个法场不远，那里是两广总督叶名琛处决红巾军的地方。红巾军是此前两年控制了广东省的一支起义军。在6至8月间，叶名琛的军队将他们怀疑为红巾军成员的七万五千人全

部斩首。

容闳参观了这个地方。“地面上完全是血流成河。车道两侧都是无头的躯干，成堆放在一起，等着被拉走埋掉。”法场周边的空气都弥漫着尸体的恶臭。此情此景是容闳对中国的恐怖记忆，曾经使他迫切地想要返回美国。他记述，回家之后“我觉得内心无比胆怯而忧郁，我对食物毫无胃口，当夜晚来临之时，我紧张得无法入睡”。

此后，他作为一名美国医生传教士当了三个月的私人秘书，这位传教士是由美国在华外交官指派的。容闳每月挣十五美元，但他没有什么事可做。

随后，他搬到了香港，住在英国记者安德鲁·萧德锐（Andrew Shortrede）的家里。容闳在美国时，萧德锐曾资助过他。容闳成为香港最高法院的一名口译员，每月挣七十五港元，他开始学习法律。

此举引起了英国律师的抗议，他们担心只有容闳掌握英文和广东话，他将垄断所有关于中国的法律业务。他们成功地将容闳逼出了这个圈子。负责人礼貌地告诉容闳，他必须找处地方学习法律，但当时并没有这样的地方。

“我要是能在法律专业上获得成功，可能早就发财了。”另一方面，在香港停留可能会阻碍他在中国这样更大的舞台上一展所长。所以，1856年8月，容闳很开心地搬到了上海。

上海新生活

他在海关总署找到了一份翻译的工作，每月可以挣到一百墨西哥元。四个月之后，他愤然离开，因为他发现在翻译与中国船东之间，存在着一种司空见惯的贿赂体系。海关总署的署长曾提出将他的薪水翻倍，让他留下来。但是他却认为这是原则问题，非走不可。

后来，他成为一名英国茶叶和丝绸商人的文书。合伙人在六个月之后将公司解散，容闳回归翻译工作，他在这方面很有天赋。

此后他受雇于一家英国公司——宝顺洋行，担任内陆经销商。这份工作不仅给了他优厚的薪水，还让他有大量机会在国内旅行，了解自己的国家。他一路前往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检查茶叶和丝绸的生产和销售。这次旅行花了他六个月的时间，从3月一直持续到8月。这是他第一次深入中国内陆。所见所闻坚定了他的信念，这个国家需要彻底的变革，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必须进入主流社会。

1859年秋，在两名传教士的陪同下，他前往南京会见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我的目标是判断太平天国是否具备我所满意的特质，这些人是否适合建立一个取代清王朝的新政府。”

一行人抵达了南京。11月19日，他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侄子见面。容闳表示，如果太平天国接受他提出的七项建

议，他愿意为这支叛军服务。这七项建议包括：按照科学理论成立军队，分别为陆军和海军军官开设学校，建立现代化的银行体系，设立带评级标准的教育体系，把《圣经》纳入教材，建立工业学校的系统。

返回上海之后，他撰写了一份关于太平天国的评估。他认为根植于整个行政体制的腐败、官员对百姓的剥削，以及一个“建立在欺骗和谎言之庞大系统”之上的政府，正是发生叛乱的原因。

但他还是失望地离开了，因为他看到太平天国并没有建立一个新形式政府的、全新的政治理念或准则，他们并未给中国带来益处。“（太平天国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上帝用这股充满活力的力量打碎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停滞状态，并唤醒它追求全新国家生活的意识。”

他重新做起茶叶贸易，并成功地从太平军控制的区域运回了六万五千箱茶叶，他带领茶船穿越了叛军和土匪活动猖獗的危险区域。任务结束之后，他因压力病了两个月。他建立了自己的茶叶代理生意，经营了三年。

回国后的早期，容闳发现自己正身处两个世界之间——他既是中国人，也是西方人，但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他发现在香港和上海的外国人对中国人有很深的偏见。老外中的美国人对待容闳要比其他外国人好，因为他毕竟在美国留过学；而另一方面，许多中国人又觉得他太西化了。

那个时候，中国人在十八九岁到二十出头就会与父母选定的伴侣结婚，但容闳没有结婚，因为他无法接受这种婚姻。他是主流中的离经叛道者。

曾国藩

1863年7月，他收到了来自两江总督曾国藩的邀请。曾国藩在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场动乱从1851年持续到1864年，两千万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曾国藩是19世纪中国政府中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

9月，容闳乘船沿着长江抵达南京，与曾国藩会晤。这是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时刻。当他走进屋时，曾国藩以强烈、敏锐的目光打量着他，这是容闳从未见过的目光。曾国藩询问他对中国时局的看法，容闳列举了自己对改革和公共政策的建议，曾国藩也谈了他的观点。

容闳感到很诧异。他甚至不相信中国还有这样的人——能够意识到国家衰败的根源，并了解采取哪些措施进行修正。曾国藩与容闳分享了对中国持有的愿景：中国必须引进西方的理念和技术，建设现代化工业。

曾国藩给容闳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当曾国藩邀请他加入政府工作时，他欣然同意，并放弃了利润丰厚的私人生意。他

在分为九个级别的清朝官员系统中担任一名官员。终其一生，曾国藩都是容闳佩服的人。

曾国藩指示容闳出国，为位于上海西北四英里的机修厂购买机械。那里后来成为了投资百万的江南制造局。

容闳得到六万八千两白银用于此次采购。他于1864年初春抵达纽约。一位当机械工程师的美国朋友找到了能够完成这笔订单的公司——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普特南机器有限公司（Putnam Machine Co.）。

根据珠海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秘书长杨毅所说，在这次访问期间，容闳曾主动请缨参加美国军队与南方同盟的战斗，他认为这是作为美国公民的责任。但是招聘人员拒绝了他的请求，说他正在完成一项中国政府赋予的使命。如果他在战斗中死亡，还有谁能够完成呢？

这家公司需要一年时间完成订单，并将机器直接从纽约发货运往上海，途经好望角的开普敦。1865年早春，设备抵达上海，运行状态良好。曾国藩非常高兴容闳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为了表彰容闳的成绩，1865年10月，他获晋升为五品官，担任口译和笔译，月薪高达二百五十美元。他设立了翻译局，在未来的十年中翻译了超过一百部著作，其中包括帕森斯的《合同法》（*The Law of Contracts*），关于英国法律的书，大量科尔顿地理图书和制造业书籍，还有西方一本每年出版四次、介绍时事政治的杂志。

1867年，曾国藩见到了兵工厂的竣工，非常高兴。容闳说服他增建一所技工学校，教授机械工程，从而使中国人能够摆脱外国人独立工作。后来，在1873年春天，他用十万美元采购了五十把加特林枪，此后又陆续完成其他订单并运回中国，这使中国拥有了最现代化的武器。

江南制造局后来成为东亚最大的武器工厂，于1868年生产出第一艘国产蒸汽船。在改革派建立的兵工厂中，江南制造局的预算最充足，每年有四十万两白银。这里大多数的高级技术人员都是西方人。

容闳为政府完成的另一项任务是撰写中国在秘鲁劳工状况的报告。他在两位美国朋友的帮助下，于1873年完成这份报告。撰写报告历时三个月，其中包括许多在夜间秘密拍摄的照片：劳工们后背撕裂，伤痕累累，甚至被毁容。他将报告送到北京。这份报告引起了众怒，劳工的交易也被终止。

1868年，他向政府提出了四点建议：一、组织一家股份制轮船公司，完全由中国人拥有及经营。轮船将携带大米，从上海和其他南方城市驶往北京。二、派遣一百二十名学生前往美国，学生分为四批，每批三十人。他们的年龄从十二到十四岁，将用十五年完成学业。这项计划应该无限期地进行下去。三、发展矿业和铁路，不过中国当时没有矿山工程师。四、严禁外国传教士在民事或刑事案件中，对其皈依者行使管辖权。

容闳将这四点建议提交给时任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但是他

不久后就去世了，也就没有人考虑这些建议。容闳深感失望，大部分时间都独来独往。

此后，在1870年冬天，政府接受了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建议。容闳的主要论点是，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中国没有几位训练有素的人可以代表中国。其结果是，许多重要的岗位，如炮台、军舰、军队和海关都由外国人把持，他们又会忠于谁呢？

这种观念的改变正是受了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影响，他们两位是政府中最重要的改革者。李鸿章是清朝晚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尽管遭受来自政府多方面的强大阻力，他仍竭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政府筹集了一百五十万美元完成这项计划。容闳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两年之内，他寝食难安。这已经是他回国以来的第十六年，是他构思这个想法的第二十个年头了。没有他的决心和坚持，这个计划永远不会付诸实现。

教育项目——终身使命

1870年冬，容闳前往南京拜见曾国藩，并处理项目细节——设立预科学校、预算学生的数量、资金从哪里来、学生将在美国学习几年等。

政府将支付所有学习和生活的费用，并将设立一个中国教

育署，组成人员包括两位传教士、容闳、秦林品、两名中文老师和一名翻译。秦林品供职于翰林院，派他前往是为了让学生保持他们的中文知识。

作为支付全部费用的条件，政府定了几个规定：学生们必须在完成学业后返回中国，为政府工作；他们不得剪掉辫子，不得皈依基督教，不得谈恋爱。

最初，政府决定派十五至十九岁的孩子赴美，后来改为九至十五岁。因为他们希望学生回国之前在美国生活十五年，中国人当时的平均寿命为五十至六十岁，当中须在父亲去世后守孝三年；假如学生在十九岁时出国，回国时三十四岁，而后再有三年的守孝期，这就意味着他们能为国家服务的时间可能不到二十年。

经过层层选拔后，年龄在十二至十五岁的学生赴美之前要先读一年预科，预科学校设在上海。他们的父母和监护人要签署一份协议，同意让他们离家十五年。此项计划于1871年夏天开始实施。

容闳的下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愿意将自己那么小的孩子送往美国这样一个偏远而陌生国家的家庭。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把孩子送到那么远的地方很危险，就好像完全放弃了他们。他们觉得美国是蛮荒之地，对西方世界完全没有概念。

由于当时中国没有报纸，容闳不得不亲自招收学生。他去了广东和东南沿海地区。在访问家乡南平期间，他捐赠了五百

两白银建立甄贤学校。

寻找申请人非常困难。官宦商贾之家不会签署这样的协议，只有穷人家才有可能。他前往南平和邻近村庄，与亲戚朋友交流。即便如此，他都无法找到足够的学生。他不得不前往香港，并签下了几位学生。就这样，他终于凑够了最初的三十人。

大多数申请人是广东人，其中多半来自香山。容闳的名誉和声望赢得了家长的信任。在一百二十名赴美留学的学生中，有八十四人来自广东，其中三十九名来自香山，几乎占了全部学生的三分之一。难怪香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摇篮。排名第二的是江苏省，有二十二名学生，其中八名来自上海。另有七名来自浙江、五名来自安徽、两名来自福建。

开始使命

容闳和第一批的三十名孩子于1871年8月11日出发。年轻学子的心中交织着恐惧、孤独和兴奋的情绪。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中国，对于即将前往的那个陌生而遥远的国度，他们一无所知。

抵达加州后，他们乘坐火车前往东海岸。他们从车窗外看到的是野生动物和印第安部落。他们不懂英文，无法和周围的人交流。他们抵达了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容闳决定将这里作为项目总部所在地。

容闳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正如他三十年前与马礼逊学堂的其他学生所经历的那样，如果年轻人能够住在当地的家庭，他们将最快地适应美国的生活，并能够最快地学习英文。

共有一百三十二个家庭申请接收中国学生，他们大多是医生、传教士、律师和教授。容闳了解，如果每个学生可以和一名中国同学一起生活，将会更容易适应，于是他决定每个家庭接收两名孩子。共有四十七个家庭被选中。

接纳这些学生的家庭就像对待自己的家庭成员一样对待他们，他们和孩子们一起吃饭，周日带他们去教堂参加礼拜。

这是一种突如其来的觉醒：一切都是全新的。孩子们不得不首次习惯吃西餐，即使在今天对中国学生来说，这也绝非易事。与所有清朝男人一样，学生都留着辫子，当他们在外面时，常被美国孩子追着喊“中国姑娘”。

他们不仅要完成学习英语、适应陌生的新生活这样的艰巨任务，还要继续学习中文——这是他们的政府批准该项目的条件之一。容闳在哈特福德租用的房子里有供孩子们学习中文的教室，这意味着他们的作业负担比美国孩子更重。上课时，他们要向清朝皇帝和孔子的画像鞠躬。如果没有完成中文作文，老师还会打他们。

1875年1月，容闳将总部搬到了更宽敞的一幢三层小楼，可以为传教士、老师和学生提供住宿。中国政府付了五万美元建设总部，总部中就包括学习中文的教室。总部墙上挂着三位促成此



» 清政府派往美国的第一批留学生，1871年启程之前
摄于上海

项目的中国决策者的头像：曾国藩、李鸿章和江苏巡抚丁日昌。

“我之所以要为此项目建设永久总部，就是希望将这个教育项目深深地根植于美国，从而使中国政府没有任何机会反悔。”容闳说。

三年后，孩子们的英文已经足够好，可以上学了。他们加速适应环境，就像来美国的其他年轻移民一样，他们抛弃了原有的生活，接受新的生活。因为留着辫子，他们常常遭到戏弄，有些人就把辫子剪了。但当他们拜见清朝官员时，会戴上假辫子。他们不穿中式服装，而穿美式服装。

许多人都失去了学习中文经典的兴趣，觉得这些课程毫不相干；他们也不想朝拜孔子，或是遵守清朝的礼仪旧制。他们必须完成和美国学生一样的课程：学习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地理和历史。

他们当中还有人约会美国女孩，坠入爱河。他们和美国同学一起参与运动，加入篮球队和足球队。有人甚至组织了第一支中国棒球队。此后，有好几名中国学生是耶鲁大学划船队的成员，数次战胜他们的老对手哈佛队。

有些学生受洗成为新教基督徒，少数人变得非常虔诚，并组织一批人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这种宗教信仰的改变已经被清政府明令禁止。其中一名学生在信中告诉父母，他皈依了基督教，此举非常不明智。他的父亲将此事报告给政府，政府于是命令他立即回国，因为他违反了三大禁令之一。中国官员把

他送到火车站，准备开始返国之旅。但他并没有坐上火车，而是留在美国度过余生。

19世纪70年代后期，他们开始从中学毕业，升读大学。许多人像容闳一样，进入了耶鲁大学深造。

看着他们逐渐成长进步，容闳喜出望外：“当这些年轻人抵达新英格兰时，沉重的压迫感从他们脑海中销声匿迹。他们因为得到自由而欢欣鼓舞、兴高采烈，难怪他们如此快乐活泼地投入各种体育运动。”

容闳正在实现他毕生的事业。他的计划是创建一个知识精英阶层，完成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他希望这能成为一项永久项目，让成千上万的学生来接受西方教育，并服务于中国。

容闳的项目总部是哈特福德最大的建筑，包括他本人和其他官员、员工的办公室。

任务中止

最初的四年，事情进展都很顺利。容闳与另外一名官员陈兰彬相交甚好。陈兰彬是清政府派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官员。

1876年，陈兰彬返回中国，由吴子登取而代之。虽然他原则上支持这个项目，但他更为传统，是朝廷中保守派的代表。抵达美国后，他对自己的所见所闻非常震惊，尤其是学生的

“美国化”，他感觉学生正在失去他们的“中国本性”。

当他发现有两人违反官方命令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命令他们回家。这两个学生知道将有怎样的惩罚等着他们，便无视命令，在朋友的帮助下继续完成学业。

吴子登严厉地批评了那些剪掉辫子的学生，并下令增加中国传统礼仪方面的课程。这反映出在中国本土正进行一场激烈的争辩，关于传统与改革、经典教育与西式学习。

在美国待了五年之后，学生都有了自己的主见。他们不想听从吴子登的意见，只服从容闳。吴子登决定不允许学生们继续待在美国，因为中国将“失去”他们。于是，他开始在朝廷努力实现这一计划。他甚至写信给负责外交事务的李鸿章。

尽管容闳了解美国的一切，但是吴子登的官位要高于他，而且吴子登知道如何在北京的官场开展游说活动。容闳对此完全无计可施。

在他的信中，吴子登辩解说此项任务以失败告终，因为它已经把那些年轻人变成了不可能为中国服务、却听命于外国主子的美国人。挽救当前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召回所有学生，尽管大多数学生已经在中学或者大学学习。他提供的许多信息都是误导和不真实的。

容闳在北京也有自己的支持者，但是他并不了解中国官场的规则，也不知道如何响应。他不知道如何撰写上书，或者该通过怎样的渠道正确将书信上呈。针对那些指责，他为自己辩

护，但是收效甚微。他的三个支持者中，曾国藩已经于1872年3月去世，李鸿章的势力也不如十年前那么强大。他进退维谷，举步维艰。

在这期间，有利于吴子登的转折性事件是美国国务院拒绝中国学生进入位于西点（West Point）的西点军校（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和位于安纳波利斯（Annapolis）的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The 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学习。这两所是美国陆军和海军最重要的学校，日本学生却被允许入学。

如果中国要抵御列强对其资源和主权的蚕食，急需将军队现代化。而在朝廷上，吴子登和保守派则将这种拒绝视为美国对中国抱有偏见和不友好的明证。

当时在美国升起一股反华情绪，主要是在美国白人的工人阶级中，他们认为中国人对他们的工作、社会地位和薪水构成威胁。

1881年，政府下令所有学生回国，只有三人从大学毕业。

容闳并没有接受这个决定，他动员许多在美国的朋友，帮忙说服中国政府。包括耶鲁大学校长诺亚·波特（Rev. Noah Porter）在内的一些高层人物，都向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表示抗议。

诺亚·波特在信中赞扬中国留学生的良好行为和勤奋努力。“正是由于他们的优秀表现，许多对中国人无知和邪恶的偏见

已经得到消除，被更加友善和正面的情绪所代替。”信中要求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召回学生的决定。

容闳的一些朋友甚至接触到美国前总统尤利塞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格兰特写了信给李鸿章。李鸿章也希望同学们留下，但朝廷里保守派的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

各种努力最终宣告失败。1881年6月和8月，大约二十名学生违抗命令，留在美国。回国的九十六名学生被关在上海的某礼堂，重新学习如何具备“中国性”，甚至连中秋节也不允许外出。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后，他们被分配了工作。其中一人被派往广州教英文。

许多人的学业都被突然中断，这使他们无法毕业。尽管如此，返回中国的这些学生都在不同领域为自己的国家做出了贡献，包括矿业、铁路、电信、教育、外交、商务和军事。

尽管这个项目仅持续了九年，但它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通过回国学生们做出的贡献，更是由于该项目为将来成千上万中国人树立的榜样，使他们愿意前往美国和其他国家学习新技术和思维方式。容闳理应为他的成就感到骄傲和自豪。

随着美国于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北京对该留学项目的支持也宣告结束。项目结束时，一百二十名学生中有一人死亡，七人因不同原因提前返回中国，剩余的人完成了学业或正在学习。

心碎

项目的取消让容闳非常伤心。他终身的使命就是将中国学生带到美国，他用了二十年时间才将其实现，现在却眼看着大清朝廷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将其彻底毁灭。

但是，作为清政府的忠诚官员，他和学生一起返回中国，并去拜见了自己的上司。他在北京待了三个月，其间制定了抑制在华的印度鸦片贸易，以及取消在中国和印度种植罂粟的计划。他将计划提交给政府，但却未被付诸实施。与很多其他事情一样，容闳的思想要远远领先于他的同胞们。

1883年，他仓促返回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家，照顾他的美国妻子。

他第一次结婚是在1868年，娶了朋友介绍的一位姓郑的苏州女子。他当时已经四十岁，在那个年代对中国男人来说，这个年纪结婚已经很大了，这是他非典型生活的结果。大多数中国人在父母的安排下，二十来岁就结婚了。

但是当容闳带着学生一起赴美之后，这段婚姻并没有持续下去。容夫人一直留在中国，从未出国，直至1911年去世。

1875年3月，他娶了二十四岁的美国姑娘玛丽·凯诺格（Mary Kellogg）。他们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当年容闳已经四十七岁，而她则成了他一生的最爱。

他们有两个儿子——1876年出生的马礼逊（Morrison Brown



» 容闳的美国妻子玛丽·凯诺格

Yung，容覲彤）和1879年出生的巴特利特（Bartlett Golden Yung，容覲槐）。正是为了看望妻子，容闳于1883年春回到了哈特福德。他已经离开了将近十八个月。“我发现我的妻子状态非常消沉。她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用沙哑的嗓子和我打招呼。她非常憔悴。”

造成她这种状态的部分原因正是担心容闳在中国的安全，害怕他因为赴美留学的项目而遭到报复。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尽其所能给她最好的照顾，带她去美国更温暖、更干净的城市生活，以改善她的健康状况。但是，他无法挽救她的生命。1886年6月28日，她死于急性肾炎，一种肾脏疾病。她被安葬在城里的雪松山公墓（Cedar Hill cemetery），去世时年仅三十五岁，而他们已经结婚十一年了。

在学生赴美项目失败之后，这是第二个致命的打击。“她的去世给我的生命留下了无以弥补的空白，但是她并没有让我彻底绝望、备感孤独。她给我留下了两个儿子，他们经常让我回想起她美好的生命和迷人的性格。”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容闳在岳母的帮助下，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养育儿子之中。两个儿子都跟随父亲的足迹，进入耶鲁大学学习。

对日战争

当容闳身在美国时，他一直密切关注祖国发生的一切。时局愈来愈糟。经过二十五年高速的工业和军事现代化进程，日本希望仿效欧洲殖民列强的做法。列强利用中国的羸弱和混乱来取利，日本也想这么做。1894年7月，针对哪个国家将控制朝鲜，中日之间剑拔弩张。而日本军队却接连告捷。

“我很同情中国一方，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而是因为中国本来就拥有这项权利，而日本只是找借口发动战争。”他这样写道。

于是容闳想出了一个计划——和伦敦的银行谈判，获得一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用以购买三到四艘装甲战舰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此外还买下五千人的外国武装部队，这支部队将在太平洋沿岸打击日本，分散其注意力并把日本在朝鲜的部队转移走，为中国争取招募新陆军和海军的时间。

此外，政府将设立委员会，把台湾以四亿美元抵押给西方大国，将钱花在国家陆军和海军上，进行这场战争。

让容闳吃惊的是，政府于1894年冬天批准了计划的第一部分。这是清政府绝望和无力抗击日军的表现，他们不得不依赖外国的士兵和水手进行抵抗。

于是容闳去伦敦协商贷款事宜，银行提出的条件是中国必须用其海关关税作为担保。他们深深质疑清政府的效率和廉

洁，但对由英国人罗伯特·哈特（Robert Hart）担任监察长的海关部门充满信心。

这笔交易就此陷入停滞状态。北京的清廷就是否接受交易产生了分歧。哈特不得不听从慈禧皇太后支持的和平派的意见，获得和平将涉及支付一大笔赔款，而哈特拒绝使用海关收入支付赔款。因此，清政府并未取得贷款。

容闳也没有得到关于抵押台湾计划的任何消息。

这场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日本接管了朝鲜，并占领辽宁省南部和山东省的港口威海卫。两国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承认朝鲜的完全独立，并将辽宁南部、台湾和澎湖群岛割让给日本。中国还支付库平银二亿两的战争赔款，那相当于日本政府年收入的六倍。

沉默的总督

被日本打败，令中国朝野上下为之震惊，此前预计中国能够轻松取胜的外国列强也颇感意外。日本是一个附庸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灾难？一个资源匮乏的小小岛国怎么可能打败大清帝国？

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容闳相信这将为他三十年来一直倡导的激进改革开辟新的道路。所以，在把两个儿子委托给亲戚照

顾之后，他决定返回中国。他期望这次战败可以改变清政府高级官员的心态，使他们能准备接受新的观念。

1895年初夏，容闳抵达上海。他不得不花一大笔钱置办了整套朝服。他去南京拜见江苏和浙江巡抚，向他们提出雄心勃勃的计划。

容闳建议政府委任四名实践经验丰富、能力出众、品德端正的外国人担任外交部、财政部、陆军和海军部门的顾问。政府应与他们签署为期十年的合同，并且可以续约。顾问提出的建议应该被采纳并执行。容闳和有能力的留学生可以经选拔在他们手下工作。这样，政府会逐渐以西方基础重建。日本能做的任何事情，中国都能做得更好。

总督张之洞面无表情地听着容闳激情澎湃的演讲，对他的建议不置可否。这次和1863年与曾国藩的会面有天壤之别，曾国藩的态度给了这位年轻的归国者很大的鼓舞。自此，容闳再也没见过张之洞。

容闳被任命为江南外交秘书，月薪一百五十美元。但是，没有人邀请他参与会议，或者征求他对各种政策的意见；很明显，没有人需要他的服务。所以，在南京待了三个月后，他辞职去了上海。由于身份不再是官员，他可以按照自由意志发表言论、著书立说。

国家银行与铁路

容闳的另一个建议是成立一家国家银行，启动资金为一千万两白银。他以美国银行的立法为参照，极为认真地准备文本。随后，他将文件呈给户部的两位高级官员，包括户部尚书翁同龢。他们给予他极大的帮助，删除了那些在中国不适用的条款。

正是这两位官员将容闳的建议书呈给清政府，项目得以推进：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为银行选址。容闳要求前往美国，与华盛顿财务部的专业人士探讨他的建议。

但是，容闳的建议由于受到中国最富有、最有实力的企业家之一——盛宣怀的干涉，而以失败告终。盛宣怀在北京的眼线一直将项目的信息告诉他，而他认为这个项目的推进将损害他的利益。

按照容闳的说法，盛宣怀来到北京，向两三位亲王和其他高官行贿三十万两白银。他们将项目取消，并给盛宣怀拨款一千万两白银，用于成立自己的银行。

“国家银行项目的失败根源就是中国官场体系的彻底腐败。从位高权重的皇太后直至清廷最人微言轻的官员，无不如此，整个政治框架就像一个用贪污构建而成的蜂窝，在中国只要有钱，没有什么事办不到的！”

他没有被挫折吓倒，提出了另一个项目——建设从渤海湾

的天津港到江苏省长江上的镇江港，长达五百英里的铁路线。

政府最终向容闳做出让步，条件是他要保证在六个月之内完成任务。没有中国企业家愿意资助此项计划，他不得不向外国公司筹集资金。不幸的是，他无法筹得资金，而不得不放弃此项目。

政变

在北京期间，容闳遇到了康有为、梁启超和其他与年轻的光绪皇帝交往甚密的改革派人士。光绪皇帝1875年继位，当时只有四岁。从1889到1908年，他实际上是在慈禧太后的干预和影响下统治中国的。

容闳和改革者们有许多共同的理想和观点。1898年6月，光绪皇帝推出一系列广泛的政治、法律和社会领域的变革措施，这也是清朝历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这些措施包括在北京建立一所现代大学、修建铁路和设立类似西方的预算制度。光绪皇帝的目标是以日本为榜样，使中国成为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光绪帝还遣散了数以百计的官员，他认为这些官员人浮于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勃然大怒。对他们来说，这些改革是激烈而危险的。她组织了一场军事政变。9月，军队包围皇宫并拘捕了皇帝。慈禧太后颁布诏书，指光绪不适合当皇帝，

他有效的统治时期已宣告结束。

政变组织者开始了对改革派的政治迫害。一些人被公开处决，其他人则四散逃离，容闳也在他们之中。政府以巨额悬赏通缉他。

“因为受到窝藏改革者的牵连，并对他们深感同情，我不得不逃命，并成功逃离北京。我逃到了上海的租界暂避。”他写道。容闳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协会，讨论当下的主要问题，特别是改革问题。他获选为协会第一任会长。

1899年，有人建议出于个人安全考虑，他应该离开上海。于是，他搬到了香港这处安全的地方。

1901年春，容闳赴台湾访问并会见了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他是日本帝国部队的创始人之一。儿玉源太郎微笑着告诉容闳，清政府请他逮捕容闳交给他们。“我不会扮演中国警察的角色，因此你现在是安全的。”

儿玉随后拿出一份中文报纸，上面有一篇关于抵押台湾筹集资金与日本作战的计划的的文章，他问容闳是否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容闳承认了，并向他详细讲述计划的细节。“如果再有类似的情况，我会毫不犹豫地提出同样的建议以抗击日本。”他回答道。

儿玉源太郎很高兴容闳能如此坦诚，给他派了保镖，在容闳短暂的台湾之行期间提供二十四小时的保护，避免有人刺杀他。

“那次会面是我人生中一段难忘的经历。”容闳回忆道。他没有被移交给清政府，也没有被日本人逮捕，反而被奉若上宾。

最后的岁月

1898年，美国国务卿约翰·谢尔曼（John Sherman）通知容闳，他持有了五十年的美国居民资格已经被收回，他将不被允许再次入境。尽管容闳已经提交了归化文件和由美国国务院颁发的几本护照的复印件，谢尔曼仍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现在拒绝承认他已经行使多年的特权，表面上看来是有些不公平而且缺乏理据。”谢尔曼在决定中写道，“然而，考虑到由我们国家最高法院制定的有关归化法的一些建设性意见，国务院认为承认他是美国公民是不恰当的。”他指的是1882年的《排华法案》。

然而，在朋友的帮助下，容闳从香港非法返回美国。他赶到得很及时，见证幼子巴特利特1902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容闳住在哈特福德的家，生活贫困。

1911年5月，他在家中风。

1911年革命胜利之际，容闳欣喜若狂。孙中山先生请他回国，当时他年事已高。他让两个儿子返回中国，为国家服务。

1912年4月21日，容闳在哈特福德的家中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四岁。他被葬在城市周边的雪松山公墓，在他妻子的墓旁。葬礼上，牧师在布道时说：“如果他不是年事已高，他肯定会参加革命。他对中国忠心耿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纪念

1933年3月，上海交通大学耗资十三万一千八百多元人民币设立了拥有六十二间展室的容闳堂。这里成为该校的主要的行政中心，二楼设有容闳的铜像。这座铜像后来被移往大学的校史博物馆。

1998年，康涅狄格州州长约翰·罗兰（John Rowland）将9月22日定为“容闳及中国学生纪念日”。5月5日，他的雕像与乔治·布什（George Bush）和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等人的雕像一起，放置在耶鲁大学名人堂。

在纽约唐人街，一所公立小学以容闳的名字命名。珠海有一所幼儿园和两所学校都以容闳的名字命名。广州的中山大学亦竖立了他的雕像。

他的家乡南平镇目前是珠海经济特区的一部分。容闳在1871年用五百两银子建成的甄贤学校部分被保留了下来，1902年他最后一次去了那所学校，那时他刚从政府离任，准备逃往

海外。他询问学校是否已经改用西式课程。1906年，尽管流亡在外，容闳仍获授予荣誉校长之职。

学校后来不断扩建，增加了几座教学楼和一片大操场。2007年，原来的学校关闭了，迁往新校址。旧教学楼成为了“容闳纪念馆”，楼前矗立着这位奠基者的雕像。“计划是将学校剩余的部分建成赴美留学学生的纪念馆。”学校教导主任说，“但是由于这部分资金没有到位，这座教学楼一直关闭。”按人均计算，珠海是中国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城里有数以千计的闲置公寓。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会缺乏资金，但却感到他们对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儿子缺乏尊重。

纪念馆确实很难找到——没有路牌标识，即便在村里，也甚少人知道它的存在。纪念馆内大门紧闭，并且没有外部标牌。即便如此，博物馆本身是充满回忆的——一层的灰砖建筑里有六个教室，因为容闳希望家乡的孩子即使家境贫寒也能接受教育。

纪念馆里展示了容闳和他带到美国学习的学生的许多照片和资料。他们都身穿年轻富有的美国人穿的礼服，佩戴领结，风度翩翩。但他们的表情却显得惴惴不安，好像在问这些衣服穿在他们身上是否得体。“我属于这里吗？我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呢？”

馆里还有他们在美国生活和学习期间，坚固的大学教学楼和公寓，以及寄住的美国家庭和教师们的照片。当中有许多虔

诚的基督徒，将留学生带到自己家里生活。这些人的脸上充满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友善与同情，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生都与这些中国来客保持联系。

馆内还藏有一些珍贵的照片，有一张展示位于哈特福德壮观的四层建筑，那正是容闳教育项目的总部所在地——它的建立是希望把计划延续百年，而绝非清政府给予的短短十一年时间；有一张是1894年容闳和其他耶鲁校友的合影；有一张是他在哈特福德居住了十六年，并度过晚年的简朴故居的照片；还有一张是城里容闳的墓地和墓碑的照片。

馆藏中有一份留学生的名单，包括他们的姓名、出生日期和籍贯。超过一半的人来自广东省，很大一部分来自香山。当时的口号是“教育救国”，这是容闳毕生的信念，也是当时那些中国的年轻人和国家的信念。

馆内还有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的一千八百名赴美留学生的部分照片。其他留学生则远赴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俄罗斯。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容闳的“孩子”。



» 1871年，容闳在香山設立甄賢學校，今天學校前門豎立着他的雕像



» 今天珠海的容園書院

